

学校高绩效教学与管理丛书

新课程最优化教学模式与方法

双语教学纵横谈

赵慧/著



Shuangyu Jiaoxue Zonghengtan

甘肃文化出版社

双语教学纵横谈

赵慧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语教学纵横谈 / 赵慧著.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5.8
(新课程最优化教学模式与方法)
ISBN 7-80714-158-1

I. 双... II. 赵... III. 双语教学—教学研究—
中小学 IV. C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8179 号

书 名：双语教学纵横谈
作 者：赵慧著
责任编辑：温雅莉
出版者：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 刷 者：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发 行 者：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720×1000mm 1/16
字 数：1250 千字
印 张：96
版 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714-158-1
定 价：495.00 元(全六册 含电子光盘)

前 言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人类跨入 21 世纪已经有几个年头。在教育部大力推行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一些地区开展了少教改的尝试，开展双语教学实验可以说是其中搞得比较红火的一项举措。

事实上，“双语教学”这一话题，并不是近几年才成为人们的议题。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双语教学就已经引起了我国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内地一些大城市的中小学校长、教师、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一些学校还率先开展了实验。这里的“双语教学”，已经不同于我国政府在民族聚居地区实行的民、汉两种语言的教学，而是直接把目的语确定为外语（目前主要是英语）。

近几年，在有条件（包括经济条件、教育基础、政策条件、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地区，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一定双语教学实验的条件正日趋成熟。

1. 从经济条件来说：2004 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于双语兼通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基础教育阶段必须为培养这类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而经济实力的雄厚又为双语教学实验提供了物质基础。

2. 从教育基础来说：上海、山东、江苏、浙江、辽宁、广东、北京、天津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往往教育基础也很扎实，外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卓有成效。尤其是近年来，许多中小学校面向高校和社会招聘了一大批英语

基础比较好的学科教师,这为双语教学实验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师资条件。在许多省区,从小学三年级甚至一年级就开始了英语教学,学生的英语学习意识很强,英语基础也比较扎实。此外,从教材上来说,一大批双语教材逐渐占据了双语教学的“市场”,其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远东出版社等知名出版社都相继引进或者编撰了一系列学科双语教材。

3. 从政策环境来说:上海、苏州、辽宁等省市纷纷成立了相关的双语教学实验领导小组,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激励学校开展双语教学实验,“双语教学实验学校”、“双语教育实验学校”、“双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4. 从学术环境来说: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等先后成立了全国性的双语教学学术研究机构。在教育部的努力下,双语教学已经成为高等学校评估的一个指标。高校双语教学的蓬勃开展,带动了双语教学研究的深入,也为中小学双语教学实验指引了方向。

5. 从社会环境来说:我国已经形成了重视英语学习的文化氛围。目前,中央电视台运用第九套节目全天候用外语(主要是英语)对国内外观众播送电视节目,各省市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也都出现了英语新闻节目,有的电视节目在播出时能够提供英语字幕。在文字媒介方面,除了大量的英语学习网站,《中国教育报》、《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等各种报刊都刊登了不少介绍双语教学的文章,《双语学习》、《双语学生邮报》、《双语阅读》等杂志大量涌现,国内不仅有《中国日报》、《21世纪报》、《北京周报》、《上海英文星报》等纯英文报刊,《扬子晚报》等知名报纸也增设了双语版内容。相信随着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的到来,市民对于外语教学的热情会空前高涨。

不过,随着双语教学实验的蓬勃开展,一些理论方面的迷思和实践方面的困惑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在一些地区,双语教学实验形式化、表面化甚至商业化趋势日益明显。这种现象如果持续下去,将会对双语教学事业造成实质性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对双语教学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对目前的双语教学实验的效果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本书正是基于中小学校健康、有序开展双语教学实验的需要,为广大实验教师、实

验学校校长、教育行政部门的双语教学实验决策人士以及所有关心双语教学实验的各界人士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本书的篇章结构如下：

第一章：“我国双语教学的历史”。该章中，笔者追溯了我国双语教学的历史渊源，介绍了“洋务运动”以来双语教学在我国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二章：“在争鸣中研究和认识双语教学”。该章首先介绍了目前我国双语教学研究领域基本达成的共识和存在的争议，并巧妙地运用一组包含“三”的概念，对双语教学的概念、模式、条件、意义等做出介绍，以帮助读者科学了解双语教学。

第三章：“国外及港澳的双语政策演变、教学特点与启迪”。双语教学的中外比较，是目前我国学者在研究双语教学方面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层面。本章重点介绍了加拿大、美国、瑞士、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我国的香港、澳门地区双语政策的演变、双语教学的特点以及对我国双语教学实验的启迪，为我国双语教学管理者和研究者提供借鉴。

第四章：“中国大陆的中小学双语教学实验状况”。该章从双语教学实验在我国大陆产生的背景谈起，阐述了双语教学实验在我国部分中小学得以大力推行的缘由，并介绍了上海、苏州、辽宁、青岛等省市开展双语教学实验的过程、现状、成果和可借鉴之处。此后，作者汇总自己调查和研究实验的师资状况、教材状况、课时设置等方面的资料，重点介绍了我国大陆地区中小学双语教学实验中比较普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比如实验模式的选择不当、实验的形式化等，并从教育管理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

第五章：“建立规范双语教学的三级管理体系”。在第四章的基础上，作者结合部分省市比较成功的管理经验和有关的管理学理论，提议建立一个互动高效的双语教学实验三级管理体系（包括双语教学实验的政府管理体系、专家管理体系和校本管理体系），对中小学双语教学实验进行规范化管理，以保障双语教学事业在我国中小学校长期健康、有序、扎实的发展。

本书不同于一般语言教学专著。她不仅能让读者对我国双语教学的历史和双语教学实验的现状有更清晰的认识，而且以全新的视野进行中外比较，让读者对于全球双语事业有一定的了解。同时，本书以调查研究为依据，大胆、坦率地指出我国目前双语教学实验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教育

管理学的有关理论和部分地区成功经验提出解决的办法,可以说是在努力填补双语教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

由于才疏学浅,加之时间匆忙,文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双语教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领域的领导同仁多加指教。

| 目 录 |

前 言 1

第一章 我国双语教学的历史 1

第一节 “洋务运动”与双语教学的产生 1

第二节 教会学校的“双语教学”和“洋泾浜英语” 6

第三节 解放后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 9

第二章 在争鸣中研究和认识双语教学 12

第一节 双语教学,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 12

第二节 科学了解双语教学,从“三”开始 43

第三章 国外及港澳地区的双语政策演变、教学特点与启迪 58

第一节 加拿大的双语教学:浸入式双语教学模式的典范 58

第二节 美国的双语教学:“熔炉”政策的推进剂 66

第三节 瑞士的双语教学:构建独特的多元文化 74

第四节 新西兰双语教学:保护多元文化的政策保障 77

第五节 印度的双语教学:放眼世界,培养双语型人才 82

第六节 文莱的双语教学:突变之中求突破 85

第七节 马来西亚的双语教学:保护本民族文化,培养新型人才 91

第八节 新加坡的双语教学:精英教育与国民教育的结合 97

第九节 香港的双语教学:“两文三语”的困境 104

第十节	澳门的双语教学：从个人双语现象到社会双语政策	108
第四章	我国的中小学双语教学实验状况	113
第一节	双语教学实验在我国产生的背景	113
第二节	我国部分地区双语教学实验的发展概述	132
第三节	我国中小学双语教学实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51
第四节	对存在问题的管理学思考	179
第五章	建立规范双语教学的三级管理体系	192
第一节	规范化管理的基本概念	193
第二节	建立双语教学实验的政府管理体系	195
第三节	建立双语教学实验的专家管理体系	209
第四节	建立双语教学实验的校本管理体系	217
结束语	走进多元文化时代	233

第一章 我国双语教学的历史

第一节 “洋务运动”与双语教学的产生

我国的双语教学,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时期。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看出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于是,继英、法之后,俄、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用洋枪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随着“闭关锁国”政策的破碎,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政府官员和开明绅士开始探索“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良方。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发达的文明,希望通过加强外语学习、兴办新式“学堂”来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从而挽救封建统治。“洋务运动”应运而生。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孙家鼐后来又总结归纳为“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以奕訢为首的满洲权贵势力集团,以曾国藩、左宗棠为首的湘系集团和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等人。当时,曾国藩等人先后创办了多所外国语学校,为我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提供了场所。最早的新式学校是 1862 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接着有 1863 年设立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 年开办的广州广方言馆。稍后,又有湖北自强学堂、湘乡东山精舍方言斋和

京师译学馆等。这些近代的外国语学校，大多设有英、俄、德、法、日语等科目；除教习主课外语外，还授以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和史地知识，目的是要学生读“西书”、译“西学”、学“西洋”，因为西洋书籍“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入精微”。

京师同文馆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实施“维持式双语教学”的正规学校。1862年，同文馆开办时仅设英文馆，其后法文馆、俄文馆、算学馆和学习日文的东文馆相继成立。和英文馆一样，各馆均配一位中国教师教习汉文，另外配备提调与助教数人，专管学馆其他事物。

从课程的设置可以看出，同文馆十分注意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讲授外语，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考试的内容也是中外互译。在讲解方面，他们强调中国教师和外国教师的合作授课，这可以说是我国双语教学的雏形吧。

同治三年（1864年），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借助外国武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在此过程中，他们看到西洋兵船火器、科学技术很有威力，于是奏请政府批准，先后兴办了造船、军工、机械制造、邮政、电报、矿务等工矿企业，同时办起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南京水师学堂、天津军医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和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铁路学堂、邮政学堂等一批科学技术学校。这些学堂在课堂教学和日常生活中几乎全部普及外语口语，并且大多聘请外籍人员用外语授课。例如，福建船政学堂分法国学堂和英国学堂，前者以传授造船技术为目的，用法文教授；后者以训练驾驶技术为目的，用英文教授。天津水师学堂分驾驶、管轮两科，均用英文教授。广东水师学堂一律以英文讲授为主，而广东陆师学堂一律以德文教授为主。天津和湖北的武备学堂均聘请德国军官充当教师，授课用语也是德语。^①

1874秋，英国军舰“田凫”号访问了马尾。海军军官寿尔记载了当时他所看到的船政学堂的情景：“其所习算学，洋教习皆能教授，所以船政学堂开设数年，并无汉语算学之教习……我访问学校那天，学生大约有五十人，

^① 顾卫星：《晚清“语法—翻译”教学法剖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第一班在做代数作业……两班都用英文进行教学……命题是先写黑板上，然后连续指定学生去演算推证各阶段；例题的工作完成后，便抄在一本好看的本子上，以备将来参考。我查阅其中几本，它们的整洁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有的口授的题目是用（英语）大写的。当我们想到用毛笔楷写的中国文字和用钢笔横书的拼音语言间的区别时，便更知道这是一件非凡的事。”^①

广东实学馆的章程中规定：“每日八点钟上堂，五点钟放学，每早录写上日所读西书，听洋文讲习，讲西文毕，随教授诘问答应。两年后均用西语以对。下午习西文，听讲算学。”

1895年，盛宣怀于天津创办中西学堂，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根据盛氏所拟的二等学堂章程：“二等学堂即外国所称小学堂”；“凡欲入二等学堂之学生，自十三岁起至十五岁止”；“二等学堂之学生照章须学西文四年”；“洋文教习均用华人，每班英文正教习一名，帮教习一名”。“二等学堂功课：第一年：英文初学浅言，英文功课书、英文字拼法、朗诵书课、数学；第二年：英文文法、英文字拼法、朗诵书课、英文尺牍、翻译英文、数学并量法启蒙；第三年：英文讲解文法、各国史鉴、地舆学、英文官商尺牍、翻译英文、代数学；第四年：各国史鉴、坡鲁伯斯第一年、格物书、英文尺牍、翻译英文、平面量地法。”^②学生学完四年方能升入头等学堂（即中学）。

两年后，盛宣怀又在上海创设南洋公学。1901年，南洋公学为了造就桢干大才，设立特班。特班可以说是我国最早进行纯英文教学的试点，其主要特征有：

1. 采用英文浸入式教学。盛宣怀在批复特班的文中强调：“只可以西文西语为功课之一端。”因此，特班的许多课程，如政治、理财等均以英文讲授。

2. 注重外语学习的环境建设。根据交通大学校史记载，该校当时成立了一个英文大会，其宗旨是“以增进英文上之智识，以会话演讲为主要……”，总会每学期组织一次由全小学生参加的英文演讲会和英文辩论会，获胜者由校长颁奖。

^①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三联书店出版，第23页。

^② 转引自《交通大学史（1896—194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版，第39页。

3. 动用经济手段强化英语学习意识。为了使学生经常处于学习外语的环境中,学校还规定:“在英文课及用英文讲授各课时,误用国语一语者,专科生罚铜圆两枚,二、三、四、五年级生罚铜圆一枚,初年级生免罚……在其上列课时,有必须用国语达意之处,应先以英语申明,否则照罚。”^①

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为了造就一批洋务人才,设立了经理留学事务所,并在上海成立了留学预备学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中国与美国有了“庚子退赔”之争,也就有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协议。

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签订“和约”,同意“赔偿”八国以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个所谓“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等款项,本息合计982238150两白银,由1902年起至1940年止,分39年还清,以海关、常关及盐政各进款作抵押,按照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偿付,这就是丧权辱国的“庚子赔款”。庚子赔款,超过以前所有赔款之总和,至此,中国财政、经济全面破产。根据《辛丑条约》规定,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白宫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用清朝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之下,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赞助中国教育的咨文,1908年5月25日由国会通过。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为了“答谢”美国的“友情”,清政府随即发出照会称:“本国政府久感贵国邦交之笃……敝国闻贵国大伯里玺天德曾有愿中国学子留学贵邦之言,且敝国亦仰贵国教育之发达,是以敝国政府现已决意用此退还之赔款,每年派遣学生若干人至贵国留学,已另咨贵国外务部与贵国使臣会商一切办理之法,敬布腹心,伏惟照察。”^②并另附一书致美公使,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的大体思路。随后,美国国务卿鲁特提出留学人员的基本设想,其中有“英文能直入美国大学”、“能略晓普通科学”等要求。双方协议,创办清华

① 转引自《交通大学史(1896—194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版,第41页。

② 胡适:《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录自胡寄尘编《清季野史》,岳麓书社,1985年,第183—185页。

学堂，并自 1909 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 100 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09 年 6 月，游美学务处于北京成立。1911 年春，游学预备学校在清室皇家“赐园”——“清华园”成立，定名为“清华学堂”。以后，清华学校每年的高等科毕业生全部资助留美。自 1911 年清华学堂成立到 1929 年留美预备部结束，共计派送留美生 1279 人。

清华学校（1928 年正式改名为清华大学）是我国最早大规模实施“浸入式”双语教学的学校。为了学到美国最先进的技术，造就“领袖人才”，使该校成为“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它提出了“延用美国高等初等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拘于格”的办学方针。根据这一方针，该校的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法、体育、兵操、课外活动等等，几乎全部是搬用美国学校的。在校内英语取代了汉语，成了通用的语言。除了少数功课外，绝大多数课程用英语讲授。连学校的行政会议、布告、级刊、年刊、校长和中外名人在校的讲演、学生的演讲会、辩论会和戏剧歌舞演出等等，也大多采用英文，以至于英国哲学家罗素于 1920 年参观清华以后说：“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就连当时校内的舆论也说，清华造就的学生是“感受美化最深”、“未出而先洋”，是“非中非西的人”。^①

清华学校的课程设置是这样的：中等科的课程以英语训练课为主，全部集中在上午，主要学习读本，并辅以文法、作文、默写、拼音等。除英文训练课外，还有世界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卫生、图画、音乐、修身等，这些课程也都采用英文课本，并用英语上课。这样，花在英语上的时间，每天至少也有五、六个小时。由于实验时间长，四年之后，学生的读、听、说、写能力一般都比较强。高等科四年的课程，也是参照美国学校的，譬如三、四年级学的主要就是美国大学一、二年级的课程。这样，高等科毕业生到了美国，一般都能插入美国大学三年级，学习两年后再进入研究院攻读二至三年。所以，大多数学生都能得到硕士或博士学位回国。清华学校的教育要求非常严格，口试几乎天天进行，笔试不定期举行。该校的淘汰率很高。1911

^① 黄延复：《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至 1921 年的十年间，1500 名学生中被开除的有 301 人，退学的有 135 人，淘汰率近 30%。新中国建立后，不少清华学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有的还成为新中国的科学院学部委员或常委。至于学有所长，后来成为专家学者的更不乏其例。

第二节 教会学校的“双语教学”和“洋泾浜英语”

1922 年，民国政府颁布的“新学制”，使整个教育设施（从学制、学科、教材到教学方法）由模仿日本为主转为模仿英美为主：学生从 6 岁入学，初小 4 年，高小 2 年，初中 3 年，高中 3 年，大学 4~6 年。外语由初中开始设置，绝大多数学校开设英语课程。自 1922 年至 1949 年全国解放，英语教学始终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①

中学外语课程的全面开设，为双语教学的开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当时，中学阶段对外语课程的要求是这样的：初中阶段，学生主要练习运用与日常生活非常切近的比较浅显的外语，努力通过三年的学习获得比较好的外语学习习惯和基础，并能发展外语语言应用的经验，培养和增加学生研究外国事物的兴趣；在高中阶段，学生除了练习运用比较实用的普通外语和发展语言经验外，还要对外国的近代文学作品有所了解，从而为进一步学习外国文学打好基础，学校需要想方设法培养学生“以外语为工具开展深造进修”，并能主动去研究外国文化。

这个阶段中学英语教学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1. 有些学校在初中阶段比较注意听、说、读、写的全面训练，到高中阶段一般仍侧重于阅读能力的培养。
2. 对西方的语言学和语言教学法已开始进行研究和介绍。有些学校的语音教学开始采用国际音标，韦氏音标或牛津音标渐被取而代之。叶斯帕荪(O. Jespersen)、帕默(H. E. Palmer)等人的学说开始为人所瞩目。有

^① 张同冰、丁俊华：《中国外语教育史回顾》，《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2 年第 5 期。

人还进行了一些试验,如张士一等人倡导试行“直接法”^①,林语堂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提到功能语法和交际功能等。

3. 学生接触英语的机会比较多。除英语课外,数理化等学科在不少学校里均采用英美原版教材。体育活动也常用英语术语。社会上,英美原版电影、英文报刊、商业英文招贴等很多。^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大批以中文和英文结合进行课堂教学的学校相继出现,其中最有特色的,当数一些教会学校。20 世纪初,外国教会在我国办起了学校。随着类似于“浸入式双语教学模式”的“直接法”的逐渐引入,一些教会学校陆续推行了双语教学,最早似乎在湖南的雅理中学,其后少数名牌教会大学及其附中、附小也实行双语教学。其中自小学到大学均实行双语教学而且成效显著的学校是圣约翰大学及其附中和附小。^③

圣约翰大学于 1894 年在上海创设。创设之时,该校就明文规定,不论何种系科,所用的教科书、参考书(包括中国的历史、地理等)都用英文编印。在课堂教学中,不仅外籍教师用英文讲课,教师华人也用英文授课。学校的一切布告、往来公函、会议发言一概用英文。在 1893 年举行的中华教育会第一届年会上提出,凡是有条件的学校应在校内制造一种全盘英语化的气氛,使学生在校内如同置身于英国、美国一样。美国圣公会牧师卜舫济在 1896 年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上提出,教会学校应尽量使用外语教材,用外语进行教学。这届年会后,在各地的教会学校中,英语开始逐步成为学校的基本教育语言。

实行“新学制”的时候,圣约翰大学及其附中和附小只有国文(汉语文)和中国史两门课程用汉语教学,其他课程以及校内外活动一律用英语。圣约翰之外运用双语教学并取得成效者仅有金陵大学及其附中等屈指可数的几所学校。其他一些教会学校以及非教会学校也有引用双语教学的,但一般都欠规范且无显著成效。^④ 有的教会学校由于不能聘请到国外的师资,只能请本国教师“半土半洋”地授课,学生看的是英文教材、听到的却是

^① 所谓“直接法”,是与“翻译法”相对立的一种外语教学法,主张直接用外语教授外语,特别强调以口语为基础的原则和以模仿为主的原則。其代表人物是贝力兹、艾盖尔特和帕默。

^② 张正东:《论双语教学》,《中小学外语教学》,2002 年第 8 期。

^③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版,第 241—242 页。

^④ 张正东:《论双语教学》,《中小学外语教学》,2002 年第 8 期。

中文讲解。

在其他一些大学里,各系各专业的大学一、二年级的英文课,也大多用直接法进行教学;各课程均以原版教材为主,侧重听说训练。相比较而言,一般大学主要采用语法翻译法,基本上不作听说训练,因为,听说能力的训练一般交由中学阶段解决。普通大学英语教学的任务是:在中学英语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阅读和翻译能力,为日后出国留学或就业创造条件。大多数学生学习英文的目的在于阅读英国文学作品或专业原版书籍,对于听说并不注意;打算日后出国留学或到外商经营的工矿企业、银行、商行就业的学生,则比较注意听说能力的训练。学生进入大学后主要是阅读英文书报和参考书籍,而且各课程(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课本也大多采用原版教材,所以阅读和翻译便成了大一大二英文课的主要教学活动。所以,总体而言,当时在普通大学虽然采用原版教材的情况很多,但是大多没有开展双语教学。

半殖民地的社会使英语不正常地流行起来,这对学校的英语教学有不少的影响。尤其是教会学校在大城市的出现,使得英语学习很快推广开来。很多人以能够讲英语为荣,哪怕是土洋结合、不伦不类的“洋泾浜英语”^①。

“洋泾浜英语”是19世纪中外贸易交往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广泛流行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最早的沿海通商口岸。它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混合性和不规范性。作为通事英语,它成了当时通事们与外国人交流的必要的工具,在近代对外贸易、外交和文化接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②“洋泾浜英语”的学习方法非常特殊。因为它是一种口头语言,不供书面使用,加之没有语法规则,因此多以口授或者汉语注音的方法来学习它,导致中国的通事只能勉强听说而不会读写。^③

说起“洋泾浜英语”,你也许会情不自禁想到20世纪初的上海滩,想起

^① “洋泾浜英语”发祥地是旧上海的英租界。184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强迫清政府苏松太道宫慕久签订了所谓的《上海租地章程》,又叫《上海地皮章程》,规定划出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作为英人“租界”居住地,以此作为英国侵略势力渗透入中国的基地。此后,其他侵略势力纷纷效仿,使得“洋泾浜地区”成了洋人的天堂。

^② 季压西,陈伟民:《近代中国的洋泾浜英语》,《解放军外国语学报》,2002年第1期。

^③ 范延妮:《试述晚清英语教学方法及其启示》,《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3年第8期。